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九十七種

凱因斯理論及其以後的發展

Michael Stewart 著

閻子桂譯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凱因斯理論及其以後的發展

Keynes and After

Michael Stewart 著

閻子桂 譯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九十七種

凱因斯理論及其以後的發展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出版

原著者 Michael Stewart 著

翻譯者 閻 子 桂

編印者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北市重慶南路

發行者 臺灣銀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

經售者 中華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

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仁愛路

印刷者 臺灣省政府印刷廠
臺中縣大里鄉中興路

第一版序言

有兩點須要聲明。

第一，本書是1964年我重任公職以前，所委託、計畫和寫成的一部。它所含的觀點和解釋都屬於我自己與英國政府中任何人無關。

第二，許多位，特別是 Joan Robinson（第一章），Robin Major（第十一章）與 Margaret Marsh 都讀過本書原稿之某部，我感謝他們的忠告，縱然我未能經常明智的或有力的採納。我特別感謝我太太，她的批評透過智慧的完整與夫婦融洽之非常適度的混合。

1967年7月

第二版序言

原來，本書要印第二版，我有兩種理由。第一，1960年代末的許多事件，特別在國際貨幣方面，已使第二編中若干處過時。第二，本書出版的當時，我是內閣辦公室的政府官員，這自然限制了我表現的自由，甚至在這種客觀而無爭論的像本書這種著作中。

可是當我靜下心工作時，這種潛在的考慮強烈的誘惑我要從頭到尾改寫全書——不是在本書中，現在我的意見有了不同，而是因為時光之流逝，有若干問題我要詳述和有若干要略述。雖然，我並不完全受這種誘惑，可是確實受了不少。除首尾兩章外，其餘各章都或多或少的改寫過。並且還增加上一章（「貨幣主義」是由於近年來對它的興趣復活了，不是我認為這種現象特殊重要）。而所有的改寫都在設計使其迎時和清楚，轉移重點和均衡，而非任何基本意義的變動。本書的主題、語氣與論證依然如故。

1971年7月

導 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兩年，英國陷入蕭條達20年之久。介於1921年與1940年中間，失業從未低於10%，在1930年初，全世界經驗著歷史上最嚴重的暴跌，英國的失業在20%以上。

這表現了經濟制度之完全失敗。絕望的貧困與閒散的人以及荒棄的資源並存。政府孤立無援、政府所實行者是基於過去的經驗與顧問所提的建議，事情更惡化了。資本家在戰慄而馬克思主義者在摩拳擦掌。若干國家內民主制度崩潰了。英國偶然的倖存，但面臨癱瘓的嚴重失業，它是否能常存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大量失業。失業再未重返。雖然1945年有可悲的預測，英國享有充分就業現已30多年。這種巨大的變質定有許多原因。但事實證明最重要的一種是，1936年所出版的約翰梅納特凱因斯之「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在本書第一編，我們討論凱因斯著作的歷史背景，他的主張如何，與關於經濟如何運作以及政府的職責應如何，他的見解與流行的見解有何區別。總之，凱因斯的理論為何已成為近代經濟政策之基礎。

但是充分就業將會維持嗎？自戰爭以來，英國所遭受的週期性衰退是怎麼回事呢？地域失業的問題是怎麼回事呢？充分就業是否受國際流動性短缺所威脅呢？美國的高度失業是否指明凱因斯的理論不能應付自動化呢？我們是否準備激勵不斷提高物價來維持充分就業呢？充分就業是否意含長期收支差額之危機呢？成長怎樣始能納入此圖形中呢？這些便是第二編要處理的主題。

凱因斯理論及其以後的發展

目 錄

第二版序言	(1)
第一版序言	(1)
導 言	(1)

第一編 凱因斯

第一章 凱因斯其人	(1)
第二章 凱因斯以前之經濟學	(7)
第三章 兩次大戰期間之失業	(27)
第四章 一般理論	(43)
第五章 凱因斯與古典派之爭端	(69)
第六章 貨幣主義	(87)
第七章 從凱因斯看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	(99)

第二編 以 後

第八章 自戰爭以來之失業	(115)
第九章 物 價	(131)
第十章 戰後時期之成長與支付差額	(149)
第十一章 國際流動性問題	(163)
第十二章 美國：失業與自動化	(177)

第十三章	結 論		(187)
	註 釋		(191)

第一章 凱因斯其人

約翰梅納特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常被稱為天才的經濟學家與過去的經濟學巨人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馬克斯（Marx）可相提並論。誠然這是不錯的，但不是事實的全部。他確實具有高度的智力，許多人說他是他們所見的最聰明的人。他不僅是有極高智慧的學人，他更有實際把握現實世界經濟和政治問題的偉大能力。此外，三十多年來，他曾給英美的高級政治家和官員，提出許多解決方案，雖然他們不經常採取他的忠告，却洗耳恭聽。他的實用主義經常是他的原理之僕從。他熱切的要改善此世界。他對1930年代的慘狀感受特深並且嚴厲的批評政府對此未加努力。他堅信這個問題——誠然，多數的問題——以清晰的思想與堅決的行動可獲得解決。他對經濟學與政治學以外的問題富有興趣，他喜歡哲學與農學，繪畫與巴蕾舞，舊書與現代詩。許多人說他冷漠和傲慢，而對朋友却是個和藹可親的人。他是個勇敢的偶像破壞者。以他的熱情和機智，所到之處，滿屋生輝。當他去世時，許多國家哀悼他。

他於1883年生於劍橋（馬克斯死的那年），為註冊主任之子。他父親也是經濟學和邏輯教師。從一個地方預備學校，他獲得伊頓（Eton）的獎學金，他在那裡不久脫穎而出。他曾獲得古典文學，數學，歷史與英國散文獎，寫時事論文，划船，玩 Wall 遊戲都很成功，辯論，活動和仍無所不讀與幾乎成為中古拉丁詩的專家。當他於1902年進入劍橋大學皇家學院時，他已獲得非常聰明與練達的青年之令譽。

在劍橋他的活動範圍更廣大了。他以優秀的成績結束了所必修的數學，但是他的主要興趣不在數學而在其他的方面。他為其自己的樂趣而研習哲學（Alfred Whitehead以後提名凱因斯和Bertrand

Russell 為他的最優秀的學生)；他曾為劍橋學生聯合會和大學自由俱樂部的主席。在各種討論會中，他都起領導作用。他與這些人，諸如 Lytton Strachey 和 Leonard Woolf 成為至友，他們以後形成「Bloomsbury Group」的核心。他不停的研讀和辯論，仍有許多時間來划船和打橋牌，欣賞繪畫，搜集珍本，進戲院以及與家人和朋友不斷的通信。事實上，他是一個非常可敬畏的人物。

拿到他的學位一年之後，凱因斯參加文官考試。他抽空費了許多時間研究經濟學，研讀當代文學，傾聽馬夏爾 (Marshall) 的講演與受皮古 (Pigou) 的指導。但是這未能防止他在經濟學的考卷中得到相當低的分數。凱因斯本人十分清楚關於其中的經過：「我確信關於經濟學，我所知道者比考我的人更多。」他可能如此。雖然如此，他以第二名通過文官考試並被派到印度部工作。然他非常厭煩這種工作。他主要的利用時間從事自己的工作 (關於機率的論文)，兩年之後便辭職了。他宣稱其惟一的從政事功是將一隻有血統記錄的公牛送到孟買 (Bombay)。他回到劍橋後，先任經濟學講師後任皇家學院院士，他終其一生保留此院士職位。他繼續研究機率並於1921年以「機率論」(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 之名出版，此書被羅素評為「一本不能評價過高的書」，他仍然不斷追求其他各方面的興趣，從和 Henry James 早餐與 Wittgenstein 無休止的討論到重新組織學院的財務與參加大選中自由主義派集會的講演。

儘管如此，他的遞增的精力指向着經濟學——學習它，講授它，開始對它作原創性的貢獻，而且最重要的是強調經濟理論對政府和廠商所面對的實際問題之關係。1911年他成為 *Economic Journal* 的編輯——的確在那時與甚至在現在，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期刊。在1913年出版了「印度的通貨與金融」(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這證明他在印度部並未完全浪費。在這本重要的書中，至少有一章仍被視為古典著作。其結果他被任命為皇家委

員會的委員，從事檢討印度的通貨問題。其能力為主席 Austen Chamberlain 與其他的政治領袖和官員們所欣賞，不僅由於他精通，在印度金匯兌本位之出現，是否為一件有益的事之複雜問題和中央銀行系統應當如何發展，而且也由於他對政治和人類問題之感情。事實上，他已建立了罕有的人物之聲望——第一流的經濟理論家，他認識這個世界實際上如何活動。

正是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凱因斯始得到應得的名譽和成功。1915年初被徵召到財政部，初為低級職員，但他晉陞很快不久負責戰時經濟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經管關於重要的輸入，英國的外匯支出與其盟邦之協調的問題。他為路易喬治（Lloyd George）和其他的戰時領袖所瞭解與信任，縱然在其事業的初期階段，他也不是一個奉承上司的人。有一次當路易喬治關於法國的情況最後作武斷的結論與詢問凱因斯的意見時，他禮貌的回答，「如果問我的意見，我可以最客氣的講，你的看法荒謬之至。」一個職員對部長這樣講話，其感情是可想而知的，只有少數人才盡力這樣作，而凱因斯却有這種習慣。

戰爭要結束時，德國應賠款多少的問題幽然浮現，當局要凱因斯考慮此問題。他估計合理的數字為 £2,000 million，在若干年內支付。而一般的在英格蘭銀行的影響之下所達成的另一種估計為 £24,000million——全部協約國的戰費。凱因斯經常輕視銀行家的經濟智慧。對此偶發事件亦復如是。他辯稱，賠款不只是簽一張支票便了事，必須包括在德國生產財貨與無報酬的運往國外。與戰後德國經濟的規模和條件相關聯，在若干年內支付 £2,000million 的數目尚屬合理，£24,000million 的數目無論如何是不合理的。

經協約國往返磋商之後（在進行中，凱因斯提議——未成功——起初德國的賠款應由美國貸款來資助——有點像1940年代的馬夏爾計畫）終於簽訂了凡爾賽和約。其中無詳細數字，但是整個和約結構與口氣，顯然要從德國搾取大量賠款。凱因斯堅信，試圖搾

取這些賠款，不僅不會成功，反而將招致不幸的結果。他辭去財政部職務並在《和平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書中發表了他的意見。他說，「倘若我們的目的有意的使中歐貧困，我敢預言，報復將會很強」。不久便會有戰爭，「這種戰爭，不論誰勝，將摧毀我們這一代的文明和進步」。

直到今日，對於凱因斯是否正確，有兩種看法。若干人認為他的調停對於阻止德國勢力之永久被壓制發揮重要的作用並鼓勵美國從歐洲撤退之不幸事件。其他的人認為，正如凱因斯所說，這種賠款的要求是不可能的（最後德國所賠的甚至遠比凱因斯所估計的£2,000million 為少）與這種榨取德國的企圖，創造了社會革命和種下痛恨的基礎，這些便是希特勒（Hitler）成功的主要因素。有力的證據或許是在凱因斯方面。

不論正確與否，《和平的經濟後果》立刻成為一本暢銷書，它在英國的國會和政府中引起了相當的騷擾，但使凱因斯之名在多數——確實是國際的——讀者之前，却成為對當時主要經濟和政治問題，具有充分資料和有力觀點之威權。現在他突然成為極可敬畏和毀譽不一的知名人物與他對經濟政策各方面的看法，為 Manchester Guardian 和 The Nation（其後與 New Statesman 合併；凱因斯是此兩雜誌的社長）兩種刊物的讀者們所熟知。但他繼續追求多方面的興趣。他在劍橋講演，在 Bloomsbury 談論，作人壽保險公司的董事長，賺了大批金錢（為他自己和皇家學院，他是該院的 bursar），是在外匯和商品市場上以明敏的投機手段賺的。他與 Diaghilev 巴蕾舞團的一位有名的巴蕾舞星結了婚。

在1923年他出版了《貨幣改革論》（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在其中他主張英國不應當（政府和每人顯然都想要）再回到戰前的金本位制。此書乃攻擊英國經濟體制的主要支柱之一與凱因斯發現他自己實處於孤立地位。當政府顯然十分決定要返回金本位制時，凱因斯力主至少不要回到戰前的平價，但他又失敗了。

在「邱吉爾先生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Mr. Churchill)中——財政大臣作返回的最後決定——凱因斯推翻支持返回的論證，他堅持其後果為高值的通貨與持久的嚴重失業。他經常是正確的。他要求對公共工程作大規模的支出，甚至這將招致大量的預算不足，但是，對於這種「顯然不健全的觀念」，他不能提供一種理論的證明，於是便全被忽視。無論如何，對於路易喬治却有足夠的影響力，使1929年選舉時，自由黨的政綱主要的包含以高度公共支出來克服失業之諾言。

1930年凱因斯出版了「貨幣論」(A Treatise on Money)，一本將其所累積的一切貨幣知識蒸餾過的巨著與所展開的許多概念和關係，對「一般理論」中最後所形成的形式有重大的影響。他被任命為麥克米蘭金融產業委員會的委員（此會於1929年為Snowden所建立）並對於其建議有重大的影響，雖然對於公共工程的功效之勸說並未成功。

1930年他被首相任命為經濟學家委員會的主席，該會要對不斷上升的失業策畫如何處理，向政府提供意見（凱因斯的答案仍是公共工程與進口的保護稅）。1935年他開始興建劍橋藝術戲院。1936年「一般理論」出版。1937他患了嚴重的心臟病，他經常為病魔所擾以後終其餘生，為一個半殘廢的人——雖然和他相處的人很少意識到此點。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又回到財政部，這次不是職員，而是有大聲望和影響力的不受約束的顧問。他的「如何籌措戰費」(How to Pay the War)出版於1940年，關於內部戰時財政問題提出極穎新的意見。他曾積極參加許多著名的活動，諸如關於社會安全的Beveridge報告書以及1944年的關於就業政策的白皮書。他於1942年晉身為貴族，同年——他的多才多藝並未遞減之明證——被任命為新成立的「音樂與藝術促進會」的主席，數年後改為「藝術學會」。而他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貢獻是作為一個磋商者，——

事實上英國的首席代表——先談租借問題，於是在討論中，走向在 Bretton Woods 建立了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最後為戰後的美國借款。這一切談判都是極為複雜而急需的。在这一切商談中，凱因斯都是會談進行中公認的主腦，顯示瞭解迅速，想像豐富，能把握全局和細節，其機智和圓通博得全體的絕口稱讚，其所達成之結果（有人說）為他人所不及。不過，甚至凱因斯也不是永遠勝利。美國只肯答應戰後的借款（一旦租借停止與英國的生死有關），其條件足以危害英國的經濟復興——此事凱因斯悲痛的深知。他盡其全力使美國瞭解戰爭所留下來的經濟問題之性質，但他終歸於失敗。或許此種失敗嚴格的傷害了他的心。

他於1946年4月死於心臟病，享年62歲。他的死是英國的不幸，他的智慧對破碎無力的英國經濟有無限的價值。但他却遺留下，說明使世界改觀的經濟制度如何來操作的問題。

第二章 凱因斯以前之經濟學

在兩次大戰之間，嚴重的失業有一種特殊驚人的特徵。這便是實際行動的人以常識來處理它，不僅未能治癒，反而使其惡化。凱因斯對此有一種說明。他在「一般理論」中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們的觀念，比普通所瞭解者更為有力。的確，此世界很少受其他東西的支配。實際行動的人，他們自信不為任何智力所影響，但結果通常都成為某一故去的經濟學家之奴隸」。正因為1920年代與1930年代實際行動的人為死亡的經濟學家之奴隸——所謂死亡之意義是指從他們的時代以後，世界已有變遷，他們的理論所根據的若干假定已經失效——以致事情弄的非常糟糕。為了瞭解兩次大戰中間的時代與凱因斯的理論之意義，我們必須先看一看凱因斯以前的經濟學家們對就業問題說了些什麼。

斯密、李加圖與馬爾薩斯

經濟學之歷史甚久——古代的人決不是對它無知——但為實際的目的，可以亞當斯密（Adam Smith）為近代經濟學的開創人。他於1776年出版了「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密——獨特而古怪，心不在焉的教授——背向爐火，口授而令人筆錄此書與其結果或許漫談到人類知識的全部領域。在廣博的索引中（不是斯密編纂的）以 Abassides 等字開始與以 Zama 結束。雖然範圍廣博，其所最關切者是我們現在所謂「經濟成長」，書中並未真正討論就業水準為什麼會那樣。顯然，這不是引起著者興趣的問題；確實，他未發生過此問題。在斯密時代，農業仍然為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在農業社會中，就業和失業間的界線模糊不清。全家在工作，但或許就業不足。此外，工資過低、就業和失業的不同（當可以區分時），似乎無多大意義，比起社會中他種的區分來——例如地主、商人與工人間的不同。事實上，斯密簡單的假定，經常是充

分就業。①

①關於什麼是「充分就業」之簡單的說明，參閱註釋1。

第二個最重要的經濟學家是李嘉圖 (David Ricardo)，一個富有的證券經紀人與其後為議員。他的「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出版於1817年。和他以後的許多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一樣，其主要興趣集中於國民所得，在主要的社會階級——地主、資本家和工人（換言之，地租、利潤和工資）間之分配如何決定的問題。在此，我們不能談李嘉圖對經濟學之重要貢獻。與我們的目的有關之點是他認為企業家對機器和設備之投資為最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他說企業家必須賺利潤，因為他們將利潤再投資於新機器，而這種新機器可生產更多的東西，以此使國家更富裕。

照他的看法，投資於更多和更多的機器是件有益的事。李嘉圖的觀點為牧師和劍橋教師（凱因斯稱他為第一個劍橋的經濟學家）名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者所反對。馬爾薩斯今日以他的人口理論著名。照此理論有一種趨勢，使人口的增殖比食物的供給更快，其結果會有定期的飢荒。馬爾薩斯著作的這一部分，李嘉圖並不反對。但是，馬爾薩斯著作的另一方面頗引起爭論。李嘉圖和馬爾薩斯間終於展開友誼的論辯，在此我們遇到——或許是第一次——公開討論，什麼東西決定就業水準的問題。

或許因為他自己和地主階級相認同（與李嘉圖相反，李嘉圖為進取的製造業者之代言人）對於資本積累和投資於工業機器之進程，馬爾薩斯採取悲觀的看法。他主張，這種投資有使社會生產能力之增加率超過消費能力之危險。工人所收到的工資畢竟只代表他們所生產的價值之一部——以致，僅有所產的財貨之一部為工人所購買。其餘的怎麼辦呢？當在工業中安裝上更多的機器與總產量增加時，國家是否會發生「商品普遍充斥」無法售出之危險？這樣不會導向失業嗎？他接着說，當商品普遍充斥時，有一個不事生產，但

大量消費的龐大地主階級，可使不幸的日子得以避免，不是很幸運嗎？

李嘉圖的答覆，其似乎合理與可靠是顯然的。李嘉圖在1820年代所說的話，在1920年代為正統的經濟學家所鄭重的重述（如凱因斯所說，「李嘉圖就像宗教裁判所征服了西班牙一樣，完全征服了英國」）^①，他同意馬爾薩斯——商品的充斥是可能的——但只限於一種特殊的商品之暫時的充斥。某種突然的撞擊（戰爭時式或稅租的變動），結果會造成一種特殊商品需求之下落。一時的，在市場上這種商品會充斥。生產這種商品的若干機器和工人將會閒散起來。但是，此時對若干他種商品之需求將增加，因為，假如人們對一種東西消費的少，他們對其他的東西將消費的多，以此這其他商品便感到缺乏。生產這種新商品將賺到高工資和利潤，於是剩餘的勞動和資本便開始向此種工業移動。同時，勞動和資本自然將從生產再無人需要的舊工業中遷出。不久，將重建生產的新模式之均衡。於是，另一種的失業——工人或機器——可能暫時發生，當變更需求模式的過渡時期。

①李嘉圖的全勝，的確有些奇怪和神秘。這必然由於在李嘉圖的學說中，有許多地方適合於它所欲描述的環境。它所獲得的結果，與一般沒有學識的人所預期者大不相同，這一點也增加了它在知識界的威望。它的教訓，當付諸實踐時，顯得嚴肅，而且常常令人不大受用，這使它獲得令德之譽，它具有一個龐大而一貫的邏輯上層結構，它給予它以美麗的外觀。它能夠把許多社會上的不公平和顯然的殘酷，解釋為進步計畫中的一項不可避免的事件，並認為企圖改變此等事物的努力，整個說來可能害多於益，這抬高了它的威權。它對於個別資本家自由活動，給予某種程度的認可，這使它的威權獲得有力的社會力量的支持。

對於馬爾薩斯的主張，或許有商品的普遍充斥（與其涵義為廣泛的失業），因為工人只能購買他們所生產的東西之一部，這是荒謬的。此地，李嘉圖求助於一個名叫賽伊（J. B. Say）的法國經濟學家之著作。著名的「賽伊定律」最初發表於1803年與此後成為混亂的豐富源泉。通常總括為「供給創造其自己的需求」。這意含